

企業管理、性別分工與本土資產階級的想像：楊青矗與陳映真比較研究

謝世宗

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副教授

摘要

1970年代台灣歷經一連串政治、經濟與文化上的變動，同時涉及殖民主義、階級剝削與性別政治三個相對獨立又互相關連的層面。如果現今對當時歷史的理解是一種「闡連」（articulation），既對各個層面進行詮釋，也將各層面之間的關係進行連結與釐清，那麼文學作品也未嘗不能說是另類的闡連方式，只是文學闡連是透過敘事（人物與情節），加上文字修辭（如隱喻與象徵）來完成。本文從左翼的視角切入，以楊青矗《工廠女兒圈》與陳映真《萬商帝君》為主，其他相關作品為輔，除了試著釐清兩位作家，在國族、階級與性別的議題上不同的闡連方式外，也想要延續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體制的批判、思考變革的可能與對理想體制的想像，探討以下的問題：首先，兩位作家筆下的階級統治機制為何？有何異同？其次，工人（尤其女工），對此一機制的抗拒如何可能？有哪些不同形式？最後，如果當時的階級體制並不令人滿意，那兩位作家對本土資產階級的另類想像為何？透過比較兩位作家作品的異同，本文希望指出各自在階級視野上的侷限與洞見，並為思考當前台灣的歷史情境提供一個借鏡。

關鍵詞：管理、階級、性別政治、資本主義、闡連

Business Management,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Imagination of Native Capitalist Class:

A Comparison of Yang Qing-chu and Chen Ying-zhen

Elliott S.T. Shie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1970s, Taiwan had undergone a series of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involving three separate but interrelated aspects: colonialism, class exploitation, and gender politics. If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ast is nothing more than a kind of articulation—the interpretation of each entity and the linking up of different ones, then literature can be viewed as an articulation through characters and plots as well as metaphors and symbols. Taking Yang Qing-chu's *Factory Girls* and Chen Ying-zhen's *The Sage of Multinational Business* as primary examples, this paper seeks to elucidate the ways which these two writers used to articulate the issues of nationalism, class, and gender by asking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 What are the institutions of class domination in their respective works? (2) How is it possible for factory workers, especially females, to resist or fight against the hegemonic structure of management and production? (3) What would be the alternative imagination of the native capitalist clas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larify these two writers'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through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hopes of finding their limitations and insights on the class as an example for reflecting on Taiwan's current historical status.

Keywords: Management, Class, Capitalism, Gender Politics, Articulation

企業管理、性別分工與本土資產階級的想像：楊青矗與陳映真比較研究

一、導論：國族、階級與性別的闡連

1970年釣魚台事件、1971年退出聯合國、1972年與日本斷交等一連串的外交挫折，曝露了台灣在國際政治上的無力，也激發了國人的民族意識；激烈的國族意識與反殖民、反美日帝國主義的情緒互為表裡，在知識界與文化界，引發回歸鄉土、關懷社會的思潮，也開始反思戰後台灣經濟發展的弊病。從1950年代開始，國民黨政府試圖將日據以來農業為本的台灣經濟加速工業化，1960、1970年代的出口導向政策與加工出口區的設立，吸引跨國公司將勞力密集的生產線移至台灣，加工半成品再銷往歐美等先進國家。¹「以農養工」的國家政策提供工業發展所需的充足勞動力，但也造成財富分配、職業傷害、勞力剝削，農業部門沒落的問題。²當時的知識分子對此有廣泛討論，如《夏潮》從1976到1978年底，刊登多篇文章，探討關於工廠工人、礦工、農民、童工等議題。³另一方面，跨國公司與全球的產業轉移，導致全球化性別分工的重新結構。有學者估計，1973到1983年間，歐洲與美國約有一百五十萬的工人（絕大部份為女性），失去了在服飾與紡織業的工作；相對的，第三世界有超過兩百萬的女性，投入服飾與紡織業的工作。⁴就台灣而言，在國內外市場的擴張下，勞動人口需求激增，促使女性的勞動人口同步增加，比例由1965年之

1 笹本武治著，〈工業化的開展過程〉，谷浦孝雄等著，雷慧英譯，《台灣的工業化：國際加工基地的形成》（台北：人間出版社，2003），頁23-26。

2 陳玉璽著，段承璞譯，《台灣的依附型發展》（台北：人間出版社，1995.04），頁129-133；廖正宏、黃俊傑、蕭新煌，《光復後台灣農業政策的演變：歷史與社會的分析》（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6.08），頁76-81。

3 郭紀舟，《七〇年代台灣左翼運動》（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1999.01），頁219-220。

4 Swasti Mitter, *Common Fate, Common Bond: Women in the Global Economy* (London: Pluto, 1986), p. 9.

26.1%提高為1975年之32.6%，至1983年提高為35.5%。⁵ 其中的女性勞工在台灣勞力密集工業（電子、服飾、紡織等）的發展過程中，更占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

上述政治、經濟與文化上的變動，並非純然的現實描述，而是人文社會學家對台灣1970年代歷史發展的「闡連」（articulation）——對政治、經濟與性別等各個層面進行詮釋，也將各層面之間的關係進行連結與釐清。⁶ 同樣的，文學作品其實也是一種論述性的闡連，只是文學的闡連是透過敘事（人物與情節），加上文字修辭（如隱喻與象徵）來完成。以本文所要討論的楊青矗與陳映真的作品為例，二者闡釋的偏重不同，闡連出的關係也有差異。陳映真主要從國族議題切入，以經濟殖民的框架收納階級的討論，但對性別問題觸碰較少。陳映真並不否認台灣經濟的成果，然而所謂「發展」和「成長」，「是更多地按照支配性的外國經濟而不是本國經濟的需要所促成」；當世界市場的「若干重大決策的決定權都操縱在大國的手裡，除了屈從之外別無選擇的貧困國家的發展，就不得不受到大國的支配和限制了」。⁷ 台灣是否受到經濟殖民仍有爭議，⁸ 但卻是陳映真中國國族主義的論述基礎：要超越外力干涉，擺脫大國的經濟殖民與支配情境，必須超克台灣與大陸的經濟分斷，「重組中國自

5 邊裕淵，〈婦女勞動對經濟發展之貢獻——台灣之實證分析〉，國立台灣大學人口研究中心編，〈婦女在國家發展過程中的角色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台灣大學人口研究中心，1985），頁266。

6 Stuart Hall, "On Postmodernism and Articulation: 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 in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ed.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 (London: Routledge, 1996.01), p. 141. Jennifer Daryl Slack,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Articulation in Cultural Studies," in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edited by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 (London: Routledge, 1996.01), pp. 112-127.

7 陳映真，〈西川滿與台灣文學〉（台北：人間出版社，1988.04），頁77。陳映真本人的第三世界論述，主要見於〈中國文學和第三世界文學之比較〉，〈孤兒的歷史·歷史的孤兒〉（台北：遠景出版社，1984.09），頁377-397。與回應漁夫的文章〈「鬼影子知識分子」和「轉向症候群」——評漁夫的發展理論〉，〈西川滿與台灣文學〉，頁71-120。讀者亦可參考朱雙一，〈「第三世界」視野與陳映真現實主義文學理念與創作〉，封德屏編，〈陳映真創作5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文訊雜誌社，2009.11），頁163-173。

8 王振寰，〈國家角色，依賴發展與階級關係——從四個有關台灣發展的研究談起〉，《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卷1期（1988春季號），頁117-143；Richard E. Barrett and Martin King Whyte著，丁庭宇、馬康莊譯，〈依賴理論與台灣：一個異例的分析〉，丁庭宇、馬康莊編，〈台灣社會變遷的經驗：一個新興的工業社會〉（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86.06），頁55-86；龐建國，〈依賴理論的流派及其批判〉，《國家發展理論：兼論台灣發展經驗》（台北：巨流圖書公司，2005.07），頁137-194。

己的國民經濟圈」。⁹

相對的，楊青矗從階級的角度切入，除了男性工人外，亦相當關注女工的性別議題。透過學者稱之為「新新聞寫作」（New Journalism）的方式，¹⁰ 楊青矗反映的階級問題可謂無所不包，從勞資糾紛、所得不均、勞動異化、社會變遷的衝擊到性別霸權、職場性騷擾、女工的家庭、愛情與婚姻的困境，均引起當時評論者與後繼研究者的注意。¹¹ 但楊青矗對於國族議題或台灣在全球經濟體系中扮演的角色，似乎未加以深入思考，反倒認為西方企業具備較台灣進步的管理模式，是台灣本土資產階級應該學習的對象。

本文從左翼的視角切入，以楊青矗《工廠女兒圈》（1978）¹² 與陳映真《萬商帝君》（1982）¹³ 為主，其他相關作品為輔，除了釐清兩位作家，在國族、階級與性別的議題上不同的闡連方式，亦延續馬克思主義的思路——對資本主義體制的批判、思考變革的可能與對理想經濟體制的想像——探討以下一系列相關的問題：首先，兩位作家筆下的階級統治機制為何？批判的層面又有何異同？其次，面對階級剝削，工人（尤其是女工）對此一機制的抗拒或改革如何可能，以及有哪些可能的形式。最後，由於文學的闡連在反映、批判現實中，往往隱含著烏托邦的願景，所以當體制並不令人滿意時，兩位作家對本土資產階級或資本主義的另類想像為何？借用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女性主義（socialist feminism）的相關理論，本文希望透過比較兩位作家作品的異同，指出各自在階級視野上的侷限與洞見，並為我們思考當前台灣的獨特歷史情境提供一個借鏡。

9 陳映真，《美國統治下的台灣》（台北：人間出版社，1988.05），頁99。

10 范文馨，〈A Biographical and Critical Study on Yang Ch'ing-Ch'u: The Writer of New Journalism in Taiwan〉，《空大人文學報》9期（2000.10），頁55-90。

11 許俊雅，〈從楊青矗小說看戰後台灣社會的變遷〉，《台灣文學散論》（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11）；李淑君，〈資本主義及現代性下的女工——論楊青矗小說中的女工主體與處境〉，《臺灣文學評論》6卷4期（2006.10），頁71-93；侯如綺，〈楊青矗小說《工廠女兒圈》中的女性關懷〉，《臺灣文藝》182期（2002.06），頁31-47；賴佳欣，〈女兒國度的美麗與哀愁——論楊青矗《工廠女兒圈》的女工群像〉，《歷史教育》12期（2008.06），頁131-186。

12 楊青矗，《工廠女兒圈》（高雄：敦理出版社，1978.03）。以下引文皆在文末直接標明書名與頁碼。

13 陳映真，《萬商帝君》（台北：洪範書店，2001.10）。以下引文皆在文末直接標明書名與頁碼。

二、從專制體制、霸權體制到理性治理

評論者對楊青矗筆下的勞資問題多有關注，但多強調勞工與資本家對立、抗爭的一面；¹⁴ 但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勢必要勞資雙方配合，過度強調作品中的對立情節，可能忽略了勞動過程「正常」運作時，階級統治的馴化機制。延續葛蘭西（Antonio Gramsci）霸權（hegemony）的概念，布若威（Michael Burawoy）將資本主義的統治體制區分為專制體制與霸權體制。專制體制或多或少涉及威嚇（coercion），對勞工進行高壓監控，以隨意解雇作為威脅，並常常毫不掩飾勞動過程中的剝削；已然普羅化的勞工在別無選擇下，只好逆來順受，表現出認命的態度。霸權體制則是以意識形態操控與制度設計為手段，使勞工「自願配合」從事生產或製造所謂的「甘願」（consent）。¹⁵

從布若威的框架來看，楊青矗作品中呈現的工廠體制，混合專制體制與霸權體制，或者說前者向後者的過渡階段。〈龜爬壁與水崩山〉以剛國中畢業的16歲少女呂青蘭為敘事者，描述自己在針織工廠的工作經驗。在工廠中，老闆對員工的剝削便是直接而赤裸的：工廠的一部機器每天可以「生產台幣三萬五千元到四萬元的布。扣掉原料、消耗、人工、雜費、機器折舊，約可淨賺新台幣一萬元到一萬五千元」，作業員一個月卻只有二、三千元的收入（《工廠女兒圈》，頁105）。擁有生產工具的老闆，不諱言自己「賺錢像水崩山」，「拿他薪水的人賺錢像龜爬壁」（《工廠女兒圈》，頁105）。除了壓低薪資以壓低成本，老闆甚至每個月扣員工360元伙食費；不但不貼錢改善伙食，甚至自己的午餐，還是由員工的伙食費支出。因此故事中的女工，不斷抱怨「伙食差，營養不足」（《工廠女兒圈》，頁111）；在專制體制下，員工不甘願為老闆工作，多數女工因此有了換工作的念頭。

除了毫不掩飾的剝削外，專制體制亦表現在對待員工的態度上。有一位女工摸髒了董事長的車子，董事長竟然命令女工下跪道歉（《工廠女兒圈》，

14 陳曉娟，〈楊青矗小說中的抗爭主題研究〉（台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0）。

15 以上專制體制與霸權體制的概念取自布若威，但略加修改以符合本文作為小說詮釋框架的目的。Burawoy, Michael（邁可·布若威）著，林宗弘等譯，《製造甘願：壟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歷史變遷》（台北：群學出版公司，2005.04），頁376。

頁113)。藉由故事中角色的敘述，楊青矗認為董事長延續農業社會的概念，認為自己如地主一般高高在上，把員工「看成下人，看成奴隸」（《工廠女兒圈》，頁115）。老闆如此，底下的管理人員，亦是用威嚇的方法進行管理。例如〈外鄉來的流浪女〉中，領班蘇月嬌每每用嚷罵的方式，指揮底下女工的蘆筍加工作業，最後終於激起反彈，稱呼她為「女暴君……目無尊長，呼上喝下，把大家都當作奴隸」（《工廠女兒圈》，頁231-232）。專制體制除了引起勞工反彈，管理方式本身不僅沒有效率，還「養成一些員工們的被動性」；健全的制度則可以「激發員工們對工作自動自發去做；領班也可遵守制度來管理，不必全靠喊嚷」（《工廠女兒圈》，頁235）。楊青矗所謂的自動自發，即是製造勞工的「甘願」；而要勞工自願配合，或減少勞資雙方的摩擦，則必須落實布若威所謂的霸權體制。

布若威認為企業中的「內部國家」機制，如工會、申訴制度或福利制度的設計，能夠讓資方對勞方有更大的讓步空間，但也同時緩和勞資雙方的矛盾與衝突。然而，在〈秋霞的病假〉中，加工區的電子公司規定請假就不發工資（沒做沒錢），「理所當然……一般人都懂得」（《工廠女兒圈》，頁54）；生病的秋霞也不懂法定的權益，但在無法工作的情境下，勞資的矛盾立即浮上檯面。在〈自己的經理〉中，在電子公司蝕洗房工作的廖太太因化學藥品爆炸而受傷住院，公司不但不負責醫藥費，經理還趁機將她解雇。先生求助無門，找上省議員幫忙；最後公司總裁羅伯特得知廖太太因公受傷的消息，表示公司將負擔醫療費用與公傷假的薪水（《工廠女兒圈》，頁160-161）。在上述兩個故事中，工會的付之闕如與福利制度的空殼化，使得個人面臨勞動危機時，唯有自力救濟，援用國家的法令與公司進行談判和協商。

當企業本身沒有「內部國家」的機制化解勞資衝突，勞資衝突便可能上升到（外部）國家的層次；但在故事中，介入企業的國家力量（以勞動法令、社會局或安全檢查處的形式展現），必須透過議員才足以動員，亦呈現國家對勞資爭議的「消極不作為」與「積極的失職」。¹⁶ 而一旦國家未介入勞資爭

16 謝國雄，〈純勞動：台灣勞動體制諸論〉（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1997.09），頁158。

議，勞工在專制體制的威嚇下，唯有以辭職作為抵抗，也可能讓資方蒙受損失。〈龜爬壁與水崩山〉中的青蘭同樣因公受傷，公司同樣不負責醫藥費；理當為勞工爭取權益的工會仍未組成，因為「有人要發起組織工會，老闆就把他辭職」（《工廠女兒圈》，頁127）。為了向老闆表達抗議，青蘭的同學、同鄉、朋友一起辭職；最後公司因為臨時找不到工人替補，而讓生產機器閒置，公司蒙受更大的損失。由此觀之，建立霸權體制，的確是化解勞資糾紛、服務資本家利益的有效手段。

除了內部國家機制，布若威認為建立公司的「內部勞動市場」，亦即升遷與年資的制度，亦可有效製造「甘願」。一來它提倡彼此競爭，培養勞工的自主性與個人主義；其次，由下而上的流動性，化解勞工與管理階層的緊張關係；最後，確立生產價值作為資本家與勞工的「共同」利益。¹⁷ 楊青矗也認為內部勞動市場，對資本家與勞工都是有利的，因此嚴厲批判公司未能落實升遷機制，落得害人害己的下場。如〈工等五等〉中的低階工人，以怠工或偷懶的方式消極抵抗；¹⁸ 〈囿〉中的工人史堅松不願拍上司馬屁，因而遲遲無法升遷，最後在衝突中失手殺了上司；¹⁹ 〈升〉中的林天明不懂得賄賂上司，16年無法升正工，後來舉債賄賂新上任的主管，卻又受到私相授受的指責。²⁰ 台灣的工廠設有升遷與年資的制度，但仍受到私人利益（賄賂）與人情（裙帶關係）的干預；無法落實升遷制度，導致勞工的不滿與反抗。

就女工的情境而言，除了賄賂之外，性的自我剝削與交換常常成為升遷的管道。〈陞遷道上〉聚焦在兩個人的升遷上：一方面是領班侯麗珊為了升組長，委身林經理，但在事後懊悔不已；另一方面是林經理為了升遷，透過專制體制的剝削方式，迫使女工提高生產量，討好洋老闆（《工廠女兒圈》，頁163-202）。在性別政治方面，當中高階主管（廠長、經理、主任）均為男性時，上司（如故事中的林經理）藉由自己的權力三不五時性騷擾下屬（如侯麗

17 Burawoy, Michael (邁可·布若威) 著，《製造甘願：壟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歷史變遷》，頁262-263。

18 楊青矗，〈工等五等〉，《同根生》（高雄：敦理出版社，1978.06），頁67。

19 楊青矗，〈囿〉，《工廠人》（台北：文星出版社，1975.04），頁55-85。

20 楊青矗，〈升〉，《同根生》，頁189-209。

珊），甚至以升遷作為性交易的獎賞，並不是單純的個案，而是權力結構不平衡下所允許、甚至鼓勵的性剝削。如果女工升為領班（如侯麗珊）依靠的並非工作能力，而是自己出眾的外貌，那麼林經理不斷高升，靠的是直接剝削女工的勞力。就後者而言，內部勞動市場的升遷體制，不但未能化解勞資的衝突，反而激起中階管理人員與低階女工的強烈矛盾。最後，在國族政治方面，故事特別批判林經理生為台灣人，卻不懂得維護同胞的權益；為了自己私人利益（升遷），夥同外國人剝削、壓迫自己人，正是所謂的「買辦階級」。故事的最後指出，專制體制的管理方式，性別與階級權力不平衡下的性剝削，以及升遷體制本身的設計缺陷，重重加乘之下，底層女工的抵制與反撲乃是必然的結果。

相對於楊青矗關注的藍領階層勞工，陳映真的華盛頓大樓系列，聚焦跨國公司中的白領工作者或管理階層。雖然職務本身傾向知識密集的工作，強調勞心勝於勞力，著重團隊合作而非個別分工，關注行銷人員與顧客的關係而非僅止於產品本身，但白領工作者終究是公司僱員，依然是資本主義體制下的勞工。依照布若威的說法，製造甘願的霸權機制同樣需要。以〈萬商帝君〉為例，雖沒有工會的運作，但身為跨國企業的員工似乎都有優渥的薪資與福利；更制度化的升遷管道，使低階員工以升遷作為人生目標而為公司盡心盡力；由於公司負責的是行銷業務，不同於單調的裝配線工作，工作本身允許更多的個人創意。然而這些分析，似乎尚不足以說明故事中兩位高階主管陳家齊與劉福金強烈的工作認同，以及低階僱員林德旺念茲在茲的管理者職位。關於工作認同與主體生產，或許傅柯（Michel Foucault）治理（governmentality）的概念，以及後繼學者在組織管理與經濟治理上的運用，可以為本篇小說提供一個更精確的詮釋語彙。²¹

〈萬商帝君〉分為六節，第二節「Rolanto」與第六節「彼得杜拉克」

21 Michel Foucault, "Governmentality," in *Power: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 ed. James D. Faubion and trans. Robert Hurley and other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4), pp. 201-222. 組織治理的相關研究，可參見Alan McKinlay and Ken Starkey ed. *Foucault,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Theory: From Panopticon to Technologies of Self*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8).

以公司會議作為故事場景，透過對話闡述跨國公司的經營理念與管理原則。

「Rolanto」一節以劉福金與陳家齊在業務會議上的行銷售策略辯論為主軸，充斥著宛如經濟論文的對話，如劉福金說：「在一個Marketing的時代，需要，是可以創造、可以操縱、可以管理（manage）的」（《萬商帝君》，頁155）。「彼得杜拉克」一節以與會者的日記形式，詳細記錄為期四天的國際管理會議，更是充斥了管理行銷的理論。呂正惠指出小說主旨是台灣人在「跨國公司的『教育』下成為世界公民，而喪失了民族意識」，但作者卻是藉著「小說中的『經濟論文』在告訴我們」，而不是透過角色人物的「日常言行來呈現給我們」。²²

本文則認為，儘管「經濟論文」的鋪陳方式看似缺乏寫作技巧，但卻具體呈現經濟理論的「論述性」；如傅柯所說，論述（discourse）乃是一套特定的陳述、假設與語彙，用以探討特定的主題並生產知識，具有建構知識、形塑主體，進而達成理性治理的功能。²³簡而言之，論述是特定歷史情境下的產物，隱含特定的價值、詮釋與討論的方式，但卻偽裝成一種傳遞普世真理的科學語言。不論是透過會議上的論述，或者是專家學者的講授，聽聞者將此一套論述，包含特定的語彙、邏輯、詮釋與價值進行「內化」，並藉此理解工作、自我與世界的意義。更進一步，論述設定了特定的主體位置（subject position），將工作變成身分認同，²⁴如小說中不斷強調的「經理」（manager）或「馬內夾」即是一例。

召喚個體占據主體位置的方法，往往是透過看似尋常的日常實踐。如故事提到老闆紆尊降貴到經理人的辦公室，「同manager咕嚕咕嚕地講『番話』（英文）」，使得「馬內夾」在觀看者（林德旺）眼中成為極度可欲的認同對

22 呂正惠，《小說與社會》（台北：聯經出版社，1988.05），頁68-69。

23 Nikolas Rose, "Identity, Genealogy, History," in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ed. Stuart Hall and Paul du Ga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6), pp. 134-138; Stuart Hall, "The Work of Representation," in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ed. Stuart Hall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7), pp. 41-51.

24 Paul du Gay, "Organizing Identity: Making up People at Work," in *Production of Culture/Cultures of Production*, ed. Paul du Ga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7), pp. 294-296.

象（《萬商帝君》，頁207）。或是在會議中高階經理們熱烈辯論銷售策略，亦是樹立馬內夾具體形象的方法，讓原本是敬陪末座的參與者，強烈感覺到「自己是一家著名的多國籍公司中，邁向國際性舞台的管理者」（《萬商帝君》，頁170）。最根本的，在marketing management的整套知識論述下，由個別消費者所組成的市場顯現為可以操控的客體；不只是消費者的個人慾望可以控制，在市場調查與統計學的輔助下，「看不見的」消費市場開始具有可見性、可塑性，並可以為企業管理者所「管理」。因此，小說中看似瑣碎的經濟論文其實是情節的有機組成；正是透過知識論述的主體形塑，劉福金日記上的「自白」——「我屬於一個新的、聰明的、精英的、創造世界更好、更豐盛之生活的民族和人種：Global Manager！Global Marketing Man！這真是宗教性的時刻。」（《萬商帝君》，頁244）——才具有情節上的必然性與合理性。

企業形塑工作認同與宗教形塑自我認同確有類似之處，也難怪〈萬商帝君〉常常並置工作與宗教。當基督教已經成為逃避現實的鴉片時，資本主義儼然成為世俗的宗教；萬商帝君成為新的天父，「頭部的後面，有一個圓的光圈。順著光線的弧度，寫著幾個英文字母。再定睛看，赫然是MANAGER這個咒語一般的字」（《萬商帝君》，頁221）；每一個馬內夾或可說是萬商帝君的化身或分身，受到屬下的膜拜與崇敬。企業中管理幹部的會議，如同宗教的傳教儀式；管理階層則是新一代的傳教士，以管理學理論為教條（doctrine），對底下的信徒進行集體的知識施洗。透過「類宗教」主體位置的建構，雇員受到感召，內化特定的價值、思維、行為模式與世界觀，而這正是跨國公司可以達到「遠距治理」（government at a distance）²⁵的關鍵。由專家學者制定知識論述，藉由書本、管理會議與學術研討會等傳播途徑，連結跨國企業的母公司與海外的子公司，消弭中心與邊緣的分野，也使得科層體制中的管理者與執行者分享共同的知識與價值，化解資本家與勞動者的矛盾。地

25 Miller, Peter and Nikolas Rose, "Governing Economic Life," in *Foucault's New Domains*, ed. Mike Gane and Terry Johnson (London: Routledge, 1993), pp. 83-84.

球村的建立，不只依賴快速的交通運輸，更是建立在「世界大同」的知識論述上。

陳映真在他處，憂心西方消費主義的輸入，將使第三世界人民成為單向度的人，僅以個人的、享樂主義式的消費為人生目標，而忽略了社會問題，甚至不再關心民族統一的議題。²⁶ 陳映真在〈萬商帝君〉中，透過描繪跨國企業公司的遠距治理模式，真正目的是表達他的批判與憂心：「以天下為己任」的全球資本主義論述，將腐蝕跨國公司中第三世界成員的國族意識。不論是中國民族主義者陳家齊，或者台灣民族主義者劉福金，同樣被收編、吸納到全球化、無國籍管理者的主體位置，屈服在彼得杜拉克這位「萬商帝君」的統治下。因此，故事以1977年為結尾，提及美國即將與台灣斷交而與中共建交，引發台灣民眾民族主義浪潮，但在劉福金與陳家齊眼中，這些已經變成盲目的民族主義（irrational nationalism）。彼此競爭的二人，也在彼得杜拉克的名言中和解：「吾人應該將民族主義這個惡魔的毒牙拔除乾淨」。²⁷ 陳映真本人曾在跨國公司負責中級管理者的工作，甚至參加亞洲級的管理訓練會議；〈萬商帝君〉的主題意識，如陳映真所說，是跨國企業「行銷管理對於全球土著文化之令人震驚的改造力量」。²⁸ 但陳映真所關心的土著文化不只是傳統的價值、信仰與行為模式；他真正關切的或許是近現代建立起來的中國民族主義在台灣的消亡。

三、階級剝削、父權體制與抗爭的多重形式

在楊青矗的小說中，我們看到專制體制與霸權體制的混合狀態，此時過度強調抗爭，常會忽略抗爭其實有不同的形式與限制。小說中大半的工人依賴資本家的生產工具營生，即使意識到剝削與不公，也只能採取認命的態度；即使有所謂的抗爭，也常常是個人式的消極反抗，如怠工、與領班爭執或辭職，均

26 陳映真，《美國統治下的台灣》，頁117。

27 陳映真，《萬商帝君》，頁251-252。「we need to defang the nationalist monster!」一語，引自彼得杜拉克1971年的著作，見Peter Drucker, *Men, Ideas, and Politics*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10), p. 40.

28 陳映真，《西川滿與台灣文學》，頁72。

不足以改變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以《工廠女兒圈》為討論文本，或許我們需要另類的提問：資本主義如何與父權體制共謀，而抑制女工的抗爭？抗爭有哪些不同的形式？以及改變結構的抗爭如何或是否可能？

楊青矗小說中的女工面對剝削與不公卻未曾反抗，多半是因為接受了父權體制「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此一性別分工的意識形態認為女性薪資不是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因此薪水較少本來就是「應該的」；女性終將走入家庭，因此婚前的短期工作「不應該」與男性的薪水相同，更不需要給予升遷的機會。傳統的性別意識形態成了合法化資本主義剝削體制的幫兇，而這正是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所說的資本主義與父權體制的共謀。²⁹

反過來說，一旦「男主外、女主內」的意識形態遭到擱置，女工開始有了爭取權益的可能。在〈昭玉的青春〉中，絕大多數的女性臨時工一旦結婚就辭職，不在意薪資與升遷，然而昭玉17歲進廠，已經當了22年的臨時工，既錯過了適婚年齡，也無心再結婚，因此一心希望升為短僱工（尚非正工）。當昭玉排除婚後辭職的選項，全心投入工作時，她便開始強烈意識到男女的不平等。男性薪資高、升職快，而女性因為懷孕常常影響工作，因此故事中的經理堅持不讓女性擔任正職。然而與男性做著同樣工作的昭玉，開始抱怨同工不同酬，甚至質疑「天地造人怎麼只派女人生孩子，也不叫男人生孩子，夫妻輪流生」（《工廠女兒圈》，頁31）。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說法，資本主義的運作建立在不平等的階級結構與剩餘價值的剝削上，但「等值」的市場運作概念卻弔詭地與「公平」或「平等」的概念相衍生。因此當男性與女性的勞力「量化」為生產力時，相同的勞動力在資本主義等值的原則下必須被賦予相同的價格，否則「同工不同酬」的不等值／不平等就會被尖銳地凸顯。因此資本主義的市場機制，醞釀了男女平等的性別意識。然而昭玉要求「同工同酬」的平等意識，既源自資本主義的等值交換邏輯，自然難以去質疑資本主義體制的上下階層的不平等，亦即「不」同工「不」同酬亦同樣涉及不公與剝削。

29 Zillah Eisenstein, "Developing a Theory of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Feminism," in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ed. Zillah Eisenstei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p. 22.

資本主義與父權體制在共謀之外亦有其矛盾。當女性外出工作，她便（暫時）脫離原生家庭及其父權體制的束縛，尤其是媒妁之言的婚姻與養兒育女的責任；工業化的資本主義亦為女性提供在農業之外的工作機會，提昇女性的經濟自主性與消費力。³⁰〈外鄉來的流浪女〉中的主角田原卿高中畢業，因為不願意在家種田，也不願意「整天讓媒公媒婆來遊說」，選擇獨自外出到工廠工作（《工廠女兒圈》，頁227）。故事中大多數的女工面對繁重的勞動與低廉的工資，在專制體制的統治模式下，默默接受領班的威嚇管理。而田原卿受過較高的教育，有能力了解相關的法律知識與政府規定，因此起身反抗領班以及背後的體制。她藉著自己的法律知識，爭取法律許可，但資方不落實的勞工權益與福利，可稱之為「順法抗爭」的模式。³¹除了遠離家庭、經濟自主，外出工作的女性若有較高的教育水準，也可能占據一個與資本家對抗的改革者位置。

故事中的女工多數文盲，不知道相關的法律規定，而必須由工人知識分子帶領抗爭。故事中的老闆或本土資本家，其實同樣不知道法律的規定；他們或是農民出身或是本身知識水準不足，思維仍然停留在傳統的農業社會階段，不懂得建立制度要比專制統治更能為企業謀求利潤。因此故事的最後，讀者看到的是一名受教育的女工對企業老闆的啟蒙：

農業社會老闆雇人，當作下人看待，以為工人吃的飯是他老闆賜予的，任意呼喝；民生主義的工業社會，工人出勞力，老闆出機械和本錢，大家同樣為生產努力，勞資地位平等。一切都在進步，您們工廠如果不建立一個健全的制度，可能再過一陣子就請不到人。（《工廠女兒圈》，頁235）

30 Linda Y.C. Lim, "Capitalism, Imperialism, and Patriarchy: The Dilemma of Third-World Women Workers in Multinational Factories," in *Women, Men,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ed. June Nash and Maria Patricia Fernandez-Kell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3), pp. 82-83.

31 何明修，《四海仗義：曾茂興的工運傳奇》（台北：台灣勞工陣線，2008.02），頁30。

在此，集體性的改革並非由工人自發，而是需要知識分子的引導，以及工廠老闆的配合。在楊青矗的認知裡，從專制體制到霸權體制其實是一種進步，也是讓勞資雙方互蒙其利的方法。但抗爭的主體是個別的公民，而非集體的階級；抗爭對象是雇主，爭取的是法定權利，而非勞工團體與資本家進行協約（布若威所說的「內部國家」）；改革的成功與否訴諸資本家與勞工的共同利益，否則便必須倚賴政府的介入與協助。故事中政府站在勞方，似乎天真地排除官商勾結的利益結構；但於其說楊青矗美化政府，不如說表現出對政府的期待，因為在當時的威權統治下，針對雇主的激烈抗爭根本不被容許。

比依法抗爭更為根本的是制度的改變，即楊青矗所謂「工者有其廠」的概念。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透過剝削工人的「額外勞動力」（surplus labor）以獲取「剩餘價值」（surplus value），而專制體制絲毫不掩飾的剝削，正讓勞工意識到與資本家在報酬比例上的巨大差距。所得分配不公的癥結，自然是因為勞工並未擁有生產工具，對於利潤的分配沒有置喙的餘地；意識到資本家對剩餘價值的剝削與利潤分配的不平等，成為勞工形成階級意識、質疑生產體制的基點。〈龜爬壁與水崩山〉的大學畢業生黃宿嘉，便提出頗有社會主義意味的「工者有其廠」的理想：「高薪雇用女工，每年把所賺的錢分紅利給員工。讓每個員工以薪水，年資或紅利入股當股東，是工人也是老闆；資本大眾化，賺錢大家分」（《工廠女兒圈》，頁116-117）。故事中的女工，面臨低工資與高勞力，甚至暴力威嚇，但都默默忍受；唯有受教育的知識分子或工人，才是改革的動力，或走依法抗爭的途徑，或者提出「工人當老闆」的理想。

在陳映真的跨國公司小說中，多數員工以公司所形塑的工作認同為終極認同，即使受挫（如〈上班族的一日〉的黃靜雄、〈萬商帝君〉的林德旺）也未嘗想改變體制。但〈雲〉中的女工，似乎處在知識論述與理性治理之外，反而有了集體抵抗的可能。該篇小說描寫跨國公司中女工籌組工會與資方抗爭，寫作緣起於陳映真為《夏潮》工作時採訪的真實事件，但寫作過程中應該也參考了楊青矗的《工廠女兒圈》。³²或許如此，〈雲〉在性別分工與父權體制的問

32 故事中的工人作家小文即購買了《工廠女兒圈》閱讀。

題上與楊青矗的作品多所呼應。故事提到女工從事的工作被視為婚前的短期工作，所得並非家戶主要來源，而是作為補充性薪資，因此女工薪資較男性低，更難拿到退休金（《萬商帝君》，頁74-75）。雇主剝削女工，而女工亦視為理所當然，如女工何大姐就說：「我們女工也想，反正不是一輩子做女工，不想，也不敢計較」（《萬商帝君》，頁99）。女工的家人亦服膺同樣的意識形態，如小文的大哥藉著來工廠探望她的機會勸告說：「女孩子，又不一輩子當女工，將來嫁了人，享福去才是真的……工會什麼的，不要去管」（《萬商帝君》，頁103）。國家在此不但對剝削與不公消極不作為，甚至可能與資本家合謀，抵制人民集會結社的自由與勞工組織工會的權利，使得集體抗爭幾乎沒有形成的條件。³³ 因此小說中的抗爭，不但是由知識分子起頭，而且是由上而下的引導，反而具有現實的合理性。

麥迪遜的台灣分公司在中壢設廠，原本的總經理退休回美國，總公司派來年輕的艾森斯坦接任。作為台灣分公司的最高階管理者，艾森斯坦自有一套對跨國公司的論述。他認為進步的資本主義和新時代的國際企業，不應該再用「原始的、赤裸的剝削」去創造它的敵人，因為對資源國的「殘酷榨取」所激發的抗爭，結果只有玉石俱焚；「今天的國際性資本……應該……促進而不是阻礙當地政治的民主化；應該高舉而不是壓抑資源國家工人的人格、權力……從而獲致企業的成長」（《萬商帝君》，頁45）。在艾森斯坦的支持下，第三世界／本土知識分子張維傑擔任行政主任，負責籌組落實民主選舉、維護全體員工權益的新工會，但卻遭到舊有勢力的抵制，包括廠長宋老闆與手下的管理人員，以及舊工會的幹部與男性工人。

小說中女工的抗爭主要是由上而下，由艾森斯坦授權張維傑，張維傑啟發部分女工，但新工會的女性幹部的努力，也的確使越來越多的工人覺醒。然而，成立新工會所面對的壓力，不只來自固有的階級結構，父權體制亦有其作

33 小說中抗爭不易，在現實當中亦是如此，其中國家的抵制起著重要的功能。Norma Diamond著，丁庭宇、馬康莊譯，〈台灣的婦女與工業〉，丁庭宇、馬康莊編，《台灣社會變遷的經驗》，頁117-135。對台灣女工的相關研究，參見Lydia Kung, *Factory Women in Taiwan* (Ann Arbor: UMI Research Press, 1983).

用。不只是故事中的男性管理者與女工站在對立面，即使是男性工人也因為擁有較高的工薪，傾向與管理者「合謀」，抵制或冷眼旁觀同為勞工階級的女性爭取權益，如故事中「機房、倉庫、維護組的男工，沒有一個熱心要組織一個自己的工會的」（《萬商帝君》，頁58）。正如Heidi Hartman所說，資本家壓低女性的薪資除了剝削剩餘勞動力外，亦剝奪女性的經濟自主，迫使女性不得不依附男性，不得不負擔起家庭勞務與婚後養兒育女的責任。而男性工人為了鞏固父權體制下既有的性別優勢，情願犧牲勞工的整體利益，排拒女工參與更公平的勞動體制。³⁴ 簡而言之，男性自願忍受資本家的剝削，以換取家庭中父權地位的鞏固。趙剛認為陳映真的「性別化分野」限縮了現實可能的複雜性，³⁵ 但小說直指性別分工與階級意識的可能矛盾，成為陳映真少數直接關注性別議題的小說。

此外，工會的抗爭失敗，除了男工或抵制或觀望外；舊有結構的穩固與公司高層的授命亦是關鍵。一方面，宋老闆與總公司位高權重的董事長派特內有私交；因此麥迪遜遠東區部的總裁麥伯里，認為應該保留廠長的面子，不該與之決裂。另一方面，艾森斯坦最後放棄他的堅持，而真正說服他改變想法的，可以說是麥伯里回信中的這段話：

「在我看來，你的一切報告，均未顯示我們在台灣的工廠確因缺乏社會正義而表現出急迫的不安。工會的改革，並沒有獲得意想中工人方面熱烈的支持。」麥伯里先生寫道：「我不以為在沒有明白而普遍的不安與

34 Heidi Hartman, "Capitalism, Patriarchy, and Job Segregation by Sex," in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ed. Zillah Eisenstei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p. 229;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Towards a more Progressive Union," in *Women and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ed. Lydia Sargent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1), pp. 1-41. 批評者認為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相關論述，的確彌補了馬克思主義的性別盲，但是只是在階級分析之上加上性別的層次，忽視性別關係本是內建於生產關係之中。參見Iris Marion Young, "Beyond the Unhappy Marriage: A Critique of the Dual System," in *Women and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ed. Lydia Sargent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1), pp. 43-46; Barbara Marshall, *Engendering Modernity: Feminism,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Change*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88-92.

35 趙剛，《求索：陳映真的文學之路》（台北：聯經出版社／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2011.09），頁168。

不滿的情況中，推翻目前的秩序——這秩序，特別從『跨國性自由』的價值加以衡量時，無疑是落後、愚蠢、甚至是殘酷的——對於企業結構，將帶來重大的損失……」³⁶

起初艾森斯坦反對舊有的工會，因為「這種工會的代價，是怨恨、不忠，生產效率低下。」（《萬商帝君》，頁47）；而建立真正的自主工會，即是建立「內部國家」的機制，以減少勞資的摩擦，進而為公司謀求最大利潤。麥伯里的回信意味著，專制威權的統治模式即便是「落後、愚蠢、甚至是殘酷的」，但在沒有引起「普遍的不安與不滿」的情況下，貿然代之以霸權體制，未必對公司有好處。艾森斯坦從起初的抗拒，到最後肯定「麥伯里有一句話，說對了」——「對於企業經營者來說，企業的安全和利益，重於人權上的考量」（《萬商帝君》，頁119）。畢竟，民主或人權的維護不過是提升生產效率的手段，如艾森斯坦所言：「企業唯一缺少的東西，就是心肝」（《萬商帝君》，頁78）。陳映真批判或醜化外國企業的慣用方式，是描述外國上司對本土女性騷擾，但陳映真在此並未刻意醜化跨國公司，也不是批判艾森斯坦個人，而是指出跨國企業「內生的體制機轉」——為求利潤最大化，跨國企業可以罔顧企業倫理。³⁷而陳映真描述民主工會的孕育、催生與流產，目的在批判美國民主制度的偽善：美國政府向第三世界大力鼓吹民主制度，目的在服務跨國公司的利益；一旦兩相牴觸，民主、人權、自由等所謂的「普世價值」可以隨時擱置。

四、本土資產階級的（另類）想像

儘管楊青矗提出「工者有其廠」的概念，但他並非是強調階級鬥爭的馬克思主義者，反倒是鼓吹資本家與勞工合作，促進社會繁榮的「民生主義」信徒。關於他對理想本土資產階級的想像，最清楚的闡釋是以企業家為要角的兩

36 陳映真，《萬商帝君》，頁75-76。本句用了三重否定，從故事上下文來判斷，似乎與作者意圖傳達的意思不符。

37 陳映真，《西川滿與台灣文學》，頁99。

部長篇小說《心標》（1987）³⁸與《連雲夢》（1987）³⁹（後來合成《女企業家》於1990年重新出版）。這兩部捕捉「白手起家的企業家創業」的小說，一方面「是想從企業家這方面，來反映以廉價工資犧牲勞工求經濟發展，勞工所受的不公平待遇」，但另一方面，也肯定企業家對台灣經濟發展的貢獻。故事以朱琪敏的愛情為主軸，交織著企業發展的描寫：主線敘述她嫁給工廠小老闆洪耀全，得到可以發揮企管專長的機會，以及實現經營企業的雄心；故事支線聚焦被她拋棄的男友宋經生，如何在受創後投入房地產生意，但在開創事業高峰後很快便破產負債。

如同《工廠女兒圈》中的本土資產階級，朱琪敏參與經營的大豐紡織廠的董事長洪天榮就是一個「黑手變頭家」的實例。1967到1968年台灣紡織業的外銷業務蓬勃，洪天榮出售他的「中盤布行和店鋪」，賣掉老家的五、六甲地，招親戚入股，開始買地建廠房。由於資金短少，他用「場地抵押貸款建廠房，廠房抵押貸款買機器，機器抵押貸款買原料」的方式創業（《心標》，頁30），展現出謝國雄所謂的「拼闖鑽學」的小頭家冒險精神。⁴⁰日據時代小學畢業的洪天榮，無法學習現代化的管理知識，很快便使公司的經營陷入瓶頸。媳婦朱琪敏則是大學畢業，專修企業管理，為公司從無到有建立人事與會計制度，「讓雇用的人員與人事升遷有程序可循，公司的原料存貨訂貨成本收支生產的帳目清清楚楚」（《心標》，頁31-32）。家族企業憑藉著自己人的互信，以及吃苦耐勞的精神，得以白手創業，但「不能建立制度，發展就有限了」（《心標》，頁159）。因此，第一代的企業經營者，創業於「時勢造英雄」的時局，但卻有賴新一代的經營者，導入現代化的管理方式，才能「英雄造時勢」，讓企業永續發展與不斷創新。

小說特別指出傳統家庭企業的現代化程度不足。其一是不懂得照顧員工，赤裸裸剝削勞動力。朱琪敏則改善福利制度，降低女工流動率，促進員工與公司的利益。在此，日本與歐美的企業成了模仿的對象：日本老闆對員工極為照

38 楊青矗，《心標》（高雄：敦理出版社，1987.01）。以下引文皆在文末直接標明書名與頁碼。

39 楊青矗，《連雲夢》（高雄：敦理出版社，1987.01）。以下引文皆在文末直接標明書名與頁碼。

40 謝國雄，《純勞動：台灣勞動體制諸論》，頁42-43。

顧，因此員工大多數終身一廠做到底；比起日本的工廠，歐美工廠福利、薪水更多（《心標》，頁201）。不同於本土企業的土法煉鋼，西方與日本公司代表的是「最新的科學管理方法」（《心標》，頁86）；不只是現代性的表徵，也接近「工者有其廠」的理想。其二，一旦家族企業成長超過一定規模，將面臨家族人才有限的問題。朱琪敏因此建議，一方面「投資者與經營者分開，聘請有才幹能經營的人來主持業務，投資者做幕後監督」；另一方面，應該走向「企業大眾化，資本大眾化，盈利大家分」（《心標》，頁205）。「資本大眾化」正是「工者有其廠」的落實，但楊青矗的目的不在改變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而是讓資本主義更順利運作；透過股票上市並讓員工入股，資本家可以輕易讓員工心甘情願為「自己的」公司效命。⁴¹

除了企業的科學管理，楊青矗特別肯定資本家的冒險精神。宋經生本來是畫家，卻在短期間內成為一個多角經營的大企業家，所靠得不外乎他的冒險精神與獨到的眼光。他曾經低價買入一大片的農地（一坪七百），規劃成新市鎮，在十年後成為「樓擠樓、車擠車、人擠人」的商業區（一坪五十四萬）（《連雲夢》，頁235-236）。楊青矗並未思考高房價所導致的社會問題，而是視宋經生為「創造地靈的人傑」（《連雲夢》，頁221）；農民販賣田產改為建地，其中的矛盾或不公，楊青矗則認為，創造共有的經濟繁榮，少數人必要先做犧牲（《連雲夢》，頁236）。

但楊青矗也認為，資本家不必然就「擁有」他所創造出來的財富。宋經生最後興建「連雲大樓」，正好碰上經濟不景氣，但仍透過預售與貸款，賣一層、蓋一層，蓋好的大樓正好用來抵債。宋經生落得身無分文，但連雲大樓已經成為社會的共同資產，如宋經生自言：「本來建築這種大樓並非單獨一個人的力量可以達到的。僅是個人設法集合建築師、泥水匠、木匠、電工等眾人的

41 朱琪敏：「這種做法員工會覺得自己也是老闆，自己工作不是為別人做，是為自己做；自己不是公司的一支小螺絲釘，自己也有股。員工們分享公司的紅利，可以充裕他們的生活，這是企業家對社會應盡的責任，這樣也可以鼓勵員工增加生產，對公司的發展有很大的好處。至於我們的利益，有我們原來的股，利益會增加不會減少。」（《心標》，頁203-204）。讓員工覺得自己也是老闆，在部分馬克思主義者的認知中，正是霸權的運作以製造甘願的手段，甚至創造勞工的虛假意識，最終仍然是為資本家利益而服務，但楊青矗認為這是勞資雙方互蒙其利的方式。

力量，和眾人的本錢（當初是未建即廣告預售，拿預售金來建的）達成的」（《連雲夢》，頁233）。小說刻意安排宋經生破產，傳達的不只是他「荊人失之、荊人得之」的胸襟，更是間接應證「工者有其廠」的概念：無論是工廠或是房產，都是集合眾人的資本所建，產權理應歸屬大眾；儘管資本家在創造「公共財」的過程扮演了關鍵的角色，但利潤卻不該是資本家個人獨占。

宋經生在一文不名後，朱琪敏畫了一系列國畫，以「創造地靈的人」揭開序幕，描繪宋經生在荒地中，指揮工人蓋大樓，「呈現荒地中建築大廈創造繁榮的奮鬥之美」（《連雲夢》，頁219）；緊接著「創造的地靈」之一到之十，則分別呈現宋經生不同時期的建築成品。一系列的國畫以「創造地靈的人」始，正是肯定資本家作為經濟發展火車頭的角色；「創造」一辭更盛讚資本家無中生有，如「變魔術創造地靈」的本事（《連雲夢》，頁236）。然而畫作的最後兩幅則名為「暴流」與「拓荒者」：前者描繪溪水暴漲摧毀農田，後者描繪暴流後，農民重新墾荒的情境。系列畫作以建築開始，但以農民拓荒作為另一個開始，二者同為創造，但形式不同。就如同朱琪敏在成為企業家後，放棄一切重拾畫筆，為國畫開創新生命，楊青矗在肯定企業發展的同時，亦不過視之為個人生命與社會發展的一個階段。如果資本主義的體制與科技的革新已經克服物質的匱乏，那麼接下來楊青矗所期盼是精神生活的豐盈；有如馬克思的烏托邦想像，在荒地上築起高樓華屋後，文學、藝術、哲學的創造與拓荒才是楊青矗真正的期盼。

相對於楊青矗，陳映真應該是在思想光譜的另外一端；如尉天驄所說，陳映真「相信資本主義必然要遭到淘汰」。⁴²但在社會主義來臨所必須的物質條件尚未成形前，陳映真又如何想像一個相對優良的企業體制？依據依賴理論，陳映真強力批判跨國公司的經濟殖民導致第三世界的國族資本主義無法發展；但反過來說，在當時的物質條件下，陳映真期盼的與其說是資本主義的崩解，毋寧說是國族資產階級的誕生。〈雲〉中的張維傑在趙剛的論述中，代表「第

42 尉天驄，《回首我們的時代》（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2011.11），頁247。

三世界現代化知識青年」的經驗與心靈、成長與幻滅，⁴³但視張維傑為本土資產階級，我們或許可以窺探陳映真對國族資本主義的想像以及企業經過「情感轉化」⁴⁴後更具人情與倫理的樣貌。

在跨國公司上班時，張維傑對新工會的支持，其實是立基於西方知識論述建立的真理與權威。一開始，總經理艾森斯坦便要張維傑閱讀他的著作 *Multinational Freedom*；張維傑雖然似懂非懂，但對「這樣一個氣宇不凡，充滿著由深刻的理論所烘托起來的理想，滿懷敬意。」（《萬商帝君》，頁42）。知識論述的內容不能說不重要（雖然張維傑似懂非懂），但知識論述的方式（以深刻的理論來烘托）才是建立起知識等同於真理等同於權威的關鍵。藉此，論述提供了一個理想化的主體位置，並落實在艾森斯坦的權威形象上；張維傑努力組織新工會，與其說是為了女工，不如說是為了得到權威的肯定。在面臨挫折時，張維傑對女工說：「『拜託你們，』張經理獨語似地說，『為了艾森斯坦先生，請大家一定要努力，把新工會組織起來。』」（《萬商帝君》，頁95）。其中的「獨語」反映張維傑與女工缺乏真正的情感聯結，也流露出他納西瑟斯（Narcissus）般的心理癥候。如果說張維傑如同嬰兒般，自我尚是破碎、不完整的，那麼艾森斯坦如同拉岡所說的鏡像，提供他一個理想化的自我認同；經過鏡像期（mirror stage）對自我的「誤識」（misrecognition），張維傑進入以語言為主的象徵界（the Symbolic），亦即故事中跨國公司的知識論述，服膺艾森斯坦作為父權代表的「象徵陽具」（phallus）。⁴⁵

除了以艾森斯坦做為錯誤認知與認同的對象，張維傑支持女工是基於「民主」、「自由」、「人權」的文明價值，而非與底層的女工建立起任何的情感或倫理關係。但在美國夢破滅後，張維傑自己成立小型的貿易公司，只聘請一位助理（單親媽媽Lily朱麗娟），開展了企業組織「情感轉化」的過程。如果

43 趙剛，《求索：陳映真的文學之路》，頁151。

44 情感轉向的概念，主要參考組織內情感研究的相關論文，尤其是Stephen Fineman, "Emotive Subjects: Organizational Men, Organizational Masculinities and the (De)construction of Emotions," in *Emotion in Organizations*, ed. Stephen Finema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3), pp. 142-166.

45 Jane Gallop, *Reading Laca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74-92.

跨國企業所缺的就是「心肝」，亦即判斷公平正義與否的「良心」與涉及人倫與情感的「仁心」，那張維傑與朱麗娟可謂「以心交心」的典範。一開始張維傑就明言，以朱麗娟的資歷與能力，他請不起朱麗娟，但她回應：「我要挑薪水，就不到這裡來……我喜歡這個地方，OK」。當張維傑明表明願意增加一千元的薪資，朱麗娟則說等業績提昇再給她就好；兩人的互動立基於將心比心，而非僅止於利益計算與成本考量。如果之前公司的僱傭關係純粹建立在工作契約與理性管理上，兩人的互動則是立基於情感與責任：每一次朱麗娟幫張維傑完成工作，他總是「抬起頭，衷心地說：『謝謝你啊，Lily……』（《萬商帝君》，頁3）。過了下班時刻，張維傑就會「望著Lily搖搖頭，親切的說：『時間一到，你就該走的。也不知跟你說幾次』（《萬商帝君》，頁16）。不同於艾森斯坦對張維傑，在友善、親切、熱情的外表下，「有一股隱約，卻也確實的淡漠」（《萬商帝君》，頁39），張維傑與朱麗娟有的是真誠的情感交流。張維傑的兩人公司，展現孔子所謂二人謂之「仁」的倫理關係；不同於專制體制、霸權體制或者理性治理，「二人」公司的運作建立在「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上。

儘管如此，我們不該理想化兩人的關係，而忽略張維傑的轉變過程。大多數的時候，張維傑延續先前的工作經驗，展現強烈的工具理性，視其助理為「效率很高的打字、打雜的機器」（《萬商帝君》，頁123）。直到後來閱讀了女工小文的日記，他才有所領悟並進一步改變與朱麗娟的關係。小文的日記除了記載組織工會的過程外，也記錄著自己的身世與個人的情感狀態：包括母親帶著大哥與二哥改嫁，但父親對兩個兒子視如己出（《萬商帝君》，頁17）；自己出生後如何與沒有血緣關係的二哥產生深深的友愛（《萬商帝君》，頁28）。日記的分享本身即是倫理的、情感的與互為主體的（intersubjective），故而轉化早期張維傑立基民主與自由的理性但卻抽象的基礎，而充實以倫理與情感的內涵。

如趙剛指出，不同於陳映真其他小說中的家庭形象，小文的家庭是唯一

獲得「正面陳述」，並被賦予「進步與公義意義」。⁴⁶ 本文進一步認為，陳映真其實暗示「家庭」作為理想企業的原型。例如，何大姐曾向小文說：「工會，是使公司變得大家相處得更合理、更溫暖的工作」（《萬商帝君》，頁69）。工會不只為公平正義而奮鬥（「更合理」），更為企業注入情感（「更溫暖」）。因此，當抗爭失敗時，小文向其他工人呼喊：「大哥、大姊們。你們就這樣撇下我們嗎……？」時，所訴諸的不只是同為勞工的階級意識，更是同為「兄弟」與「姊妹」的「家族情感」。工會如家，亦是情感的火車頭，讓公司轉變為大家庭。當何大姐看到公司似有誠意改組工會時，明白宣示：「今後工會不只要為工人福利著想，也要為這樣子有誠意的公司著想，使我們工廠成為一個很溫暖的家庭」（《萬商帝君》，頁72）。溫暖家庭的建立，立基於為對方著想的心；有此「仁心」，資方與勞方似乎可以在家庭倫理中達成大和解。同樣，在讀完小文的日記後，張維傑留下字條邀請朱麗娟與她的小孩晚上到台北吃飯，或許不只是如詹宏志認為的「突出女性的情愛」並強調「愛的能力」，⁴⁷ 也是暗示企業如家庭的可能性。

然而，家族的情感似乎不可避免隱含對家族外成員的不信任。當跨國公司開始幫助本地勞工爭取權利時，小文對公司心存感激，但最後卻遭到的外國人的背叛（《萬商帝君》，頁104）。陳映真批判但並未妖魔化跨國公司，甚至期待它能改變角色，「做一個殷實的國際商人」；據他自己所說，他從未「反對過與跨國企業合作」。⁴⁸ 但在家族意識下，陳映真的確含有對「外人」的不信任，如〈萬商帝君〉中寫道：「是外莊人，就休想給你留下什麼好處。」（《萬商帝君》，頁187）。國族主義本身的排他性，似乎內建於國族主義本身。

46 趙剛，《求索：陳映真的文學之路》，頁196。

47 詹宏志，〈尊嚴與資本機器的抗爭——評介陳映真的作品《雲》〉，高信疆召集，姚一葦、尉天驄、葉石濤、王拓等編輯委員，《愛情的故事》（台北：人間出版社，1988.05），頁98-99。

48 在一次訪問中，陳映真說：「……沒有人反對過與跨國企業合作。不同之處，在於他們（依賴理論）要求跨國企業應該本於企業倫理，和地主國合作，遵守地主國的法律、理解和尊重地主國社會和經濟發展的目標和理想，嚴格整肅自己的紀律，絕不從事和參與破壞、干涉和顛覆他國以增大企業利潤之事。跨國企業總有面臨這樣的選擇之一日：真正『改變』它所『扮演的角色』做一個殷實的國際商人，或者是在廣大正義的世界人民之前轟然倒塌」。見陳映真，《西川滿與台灣文學》，頁99。

最後，對家族的肯定亦可能抹除了小說對性別分工的批判視野。回到〈雲〉的故事開頭，張維傑之所以憶起在跨國公司協助籌組工會的那段往事，是因為邂逅了當年一名綽號「趙公子」的女工。她曾是新工會的預備幹部，在抗爭失敗後，與其他參與的女工都被公司逼走。趙公子辭職後不久便結婚了；她自謂：「我從十五歲出來做女工。麥迪遜那一會回，忽然叫人厭倦了」（《萬商帝君》，頁9）。因為「厭倦了」，所以回歸家庭？相對於小文在離職後，從一個廠流浪到另一個廠，趙公子似乎找到了最後的「歸宿」。並且，在趙公子與張維傑的對話過程中，陳映真不斷描寫趙公子與她懷中嬰兒的親密互動，刻意凸顯其母親身分與正面特質（《萬商帝君》，頁6）。陳映真賦予家庭的「正面陳述」似乎理想化了家庭，忽視家庭中階級與性別的不平等權力結構，以及可能涉及的宰制與剝削。此外，所謂的「理想家庭」乃是立基在一夫一妻與生兒育女的婚姻體制上。小說寫到，曾經是許多女工「暗中愛戀著的『趙公子』」，結婚生子後「增添了好些初為母親的溫婉」、「減去了當時幾分彷彿少年男子似的英俊」（《萬商帝君》，頁5）。從外出工作到回歸家庭，從女工曖昧到夫妻倫理，趙公子的「正常化」（normalization）過程，似乎也間接排除了女性的其他選擇與其他另類的家庭形式。

五、結論：階級視野的侷限與洞見

楊青矗與陳映真，不論是在政治、經濟與國族立場上（右翼或左翼、獨派或統派），都有極大的差異性，但比較研究也不應忽略二者的雷同之處以及可以互補的地方。楊青矗關注藍領階級的工人，批判壓低薪資、暴力脅迫勞工的專制體制，並認為工廠中的專制體制乃傳統農業社會的殘留（residue），應該在工業化的文明過程中逐漸被取代。此時，美日公司的霸權體制被視作台灣現代化的典範：除了依循國家法令、保障勞工權益外，公司更應該落實內部勞動市場的升遷制度，以非個人化的制度取代裙帶關係（人情）與私相授受（賄賂）。故事中跨國公司的老闆，甚至會以類似「機械神」的角色出現，解決勞資爭端；反倒是身為中高階主管的台灣人，剝削同胞，圖利自己。而在陳映真關注的跨國公司中，專制體制的剝削似乎不存在；但透過知識論述的建構，跨

國公司形塑「世界大同」的工作認同，讓第三世界的知識分子「甘願」為他國企業賣命。比較而言，楊青矗似乎有美化外國人之嫌，但他尊崇的是西方的制度管理，而不像台灣公司訴諸專制與人治；唯一涉及國族的，則是批判台灣的管理者缺乏同胞愛，為諂媚外人剝削自己人。然而，如果老闆是本國人，管理人員亦可能剝削工人討好上司。因此，國族的議題事實上不過是階級的一種表現形式。相對而言，國族議題在陳映真的政治經濟學中則有獨立不可化約的地位；他工筆描繪跨國公司的治理模式，並非強調經濟上的剝削，而是擔心跨國企業的知識論述，終將消解第三世界的國族主義，妨礙民族統一。

當焦點轉移到女工時，楊青矗與陳映真同樣關注性別分工的意識形態與資本主義剝削體制的共謀，並在抗爭形式的描寫上也有類似之處。楊青矗《工廠女兒圈》中的女工抗爭，主要是「依法抗爭」的形式，爭取勞工應有的法定權利；更進一步的是「工者有其廠」的理念，打破勞資雙方的分野，讓利潤得以共享。「工者有其廠」的概念來自「耕者有其田」的想法，雖然隱含勞動者擁有生產工具的樸素社會主義理念，但楊青矗標舉民生主義，並未否定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而是強調勞資雙方的合作。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看，楊青矗的理念並未否定或改變整個階級結構與資本奕局，而是爭取利益的「公平」分配，僅是一種「獲得的政治」（politics of getting）。⁴⁹而儘管陳映真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小說〈雲〉中的女工所爭取的其實也是利益的公平分配，與楊青矗的「依法抗爭」，在手段與目標上並沒有太大的差異。

甚至兩人小說中的女工抗爭，都是由啟蒙的知識分子所發起。楊青矗的知識分子多半兼具工人的身分，但因教育程度較高，了解政府法令，得以依法抗爭。陳映真小說中的知識分子張維傑甚至不具工人身分，所主導的抗爭更是由上而下的授命。陳映真接觸過底層勞工，但卻並不相信無產階級勞工是改革的動力；他認為資本主義體制造成工人階級「沒有辦法思考」，⁵⁰反倒是「開明

49 Samuel Bowles and Herbert Gintis, *Democracy and Capitalism: Property, Community,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Modern Social Though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轉引自趙剛，《告別妒恨：民主危機與出路的探索》（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1998），頁243。

50 陳映真，《美國統治下的台灣》，頁146-147。

的、先進的、自由化的中產階級」比較可能先覺醒，由「這個階級到民間去，去幫助崩壞這個體制」才是務實的作法。⁵¹當然，工會女工並非完全被動，但對楊青矗與陳映真而言，啟蒙的知識分子仍然扮演著推動改革的關鍵角色。

兩位作家思索政治與經濟議題，同樣在各自想像的本土資產階級中，表現了對文化層面的關心。楊青矗認為如果有一天，資本主義的體制已經完成創造「經濟奇蹟」的任務，那麼接下來人們要創造的是精神生活的豐盈。作為一位作家，楊青矗的最終關懷仍是文學與藝術的創造。陳映真除了看見理性治理對第三世界國族主義的削弱外，也點出工具理性的可能弊病，如雇傭關係的異化。或許由於童年宗教與家庭生活的影響，陳映真強調人與人之間的信與愛，並以家庭作為企業藍本，嘗試在理性管理的企業中，建立起真誠的倫理關係與情感聯結。如果楊青矗看到西方科學管理的好處，陳映真則看見好處之外的可能弊病。

儘管批判資本家的剝削，楊青矗小說並未否定資本家的重要，反而認為台灣傳統農業社會的觀念妨礙本土企業的現代化，因此要向美日公司取法制度化的管理。因此，他肯定企業實施科學管理、落實升遷制度、照顧勞工福利，並提倡以股票上市開放員工入股的方式，讓員工自己「當老闆」、心甘情願為「自己的」公司效命。資方剝削勞工最終害人害己，而勞資合作可以共創雙贏，促進社會的繁榮與發展。陳映真批判跨國公司，但（至少在當時的階段）並未根本否定資本主義的跨國貿易。至少在理智上，陳映真認為跨國企業對資源國殘酷榨取，結果只有激發抗爭、玉石俱焚，但國際性資本若能促進當地的繁榮與民主，提昇第三世界工人的人權，則外國人與本地人、資本家與勞工未嘗不能共生共榮。但陳映真對外人的不信任又排除了上述的可能，最終仍然回歸中國國族主義，認為建立兩岸自己的「中國經濟圈」才是正確的道路，也是反殖民的唯一方法。

透過比較，我們可以看見兩位作家就階級問題的切入點與立場其實有巨大的差異。楊青矗（至少就文學作品而言）或許因為是藍領工人出身，並從自

51 陳映真，《美國統治下的台灣》，頁128。

身所處的階級情境出發，不只就階級論階級，亦探觸其中明顯而尖銳的性別差異；不論作家在現實中的政治立場為何，其作品中並未流露出明顯的國族主義意識，而是從現代化的角度出發，視美國、日本的企業為合作或學習的對象。換言之，楊青矗所謂的「民生主義」，內涵其實是相當線性的現代化或西化論述，只是試圖消除資本主義體制中資方剝削勞方的弊病。陳映真對階級議題的討論，主要是在經濟殖民的詮釋框架中展開，理由或許是他所觀察的工作場域是跨國公司的白領階層，但更重要的因素應該是他的中國國族主義。晚近學者強調陳映真的第三世界視野，⁵²但他的第三世界主義其實無法脫離其中國民族主義而存在；換言之，唯有先認定美台關係為經濟殖民時，才有第三世界去殖民的必要，而去殖民的不二法門則是兩岸統一，正是陳映真的國族意識所設定的政治目標。

楊青矗從自身經驗出發，除了男性工人之外，也關注女工問題，處理的階級問題廣泛而細膩，但受限於自身經驗與現代化論述，無暇在作品中思考台灣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不平等位置。陳映真受益也受限於他的中國國族主義，指出西方知識論述的建構如何收編、吸納在地的反抗潛能，但國族意識區分內外的傾向，否定台灣與西方資本主義共存共榮的可能，最後自然指向「中國經濟圈」的烏托邦作為解決方案。然而，並非「自己人」組成經濟圈就沒有階級剝削的問題，就如楊青矗在小說中呈現的，自己人常常反而比外人更兇狠地剝削自己人。比較兩位作家在階級議題上各自的侷限與洞見，對我們思考現在台灣的獨特歷史情境依然具有啟發性：一方面，由下而上的、微觀而細膩，並關注性別（與種族）面向的階級視野仍然不可或缺；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現象加劇、亞洲大國崛起的時刻，宏觀全球經濟體系的視野越是顯得重要。只是國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容易陷入自己與外人的二元對立，有時反而模糊了階級本身的複雜性，卻是不可不小心避免的。

52 晚近的論文包括：朱雙一，〈「第三世界」視野與陳映真現實主義文學理念與創作〉，《陳映真創作5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63-173；趙剛，〈求索：陳映真的文學之路〉，頁151-176；陳光興，〈陳映真的第三世界：狂人／瘋子／精神病篇〉，《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8期（2010.06），頁215-268。

參考資料

一、專書

丁庭宇、馬康莊編譯，《台灣社會變遷的經驗：一個新興的工業社會》（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86.06）。

何明修，《四海仗義：曾茂興的工運傳奇》（台北：台灣勞工陣線，2008.02）。

呂正惠，《小說與社會》（台北：聯經出版社，1988.05）。

谷浦孝雄等著，雷慧英譯，《台灣的工業化：國際加工基地的形成》（台北：人間出版社，2003）。

封德屏編，《陳映真創作5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文訊雜誌社2009.11）。

高信疆召集，姚一葦、尉天驄、葉石濤、王拓等編輯委員，《愛情的故事》（台北：人間出版社，1988.05）。

尉天驄，《回首我們的時代》（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2011.11）。

許俊雅，《台灣文學散論》（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11）。

國立台灣大學人口研究中心編，《婦女在國家發展過程中的角色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台灣大學人口研究中心，1985）。

陳玉璽著，段承璞譯，《台灣的依附型發展》（台北：人間出版社，1995.04）。

陳映真，《上班族的一日》（台北：洪範書店，2001）。

———，《西川滿與台灣文學》（台北：人間出版社，1988.04）。

———，《孤兒的歷史·歷史的孤兒》（台北：遠景出版社，1984.09）。

———，《美國統治下的台灣》（台北：人間出版社，1988.05）。

———，《萬商帝君》（台北：洪範書店，2001.10）。

楊青矗，《工廠女兒圈》（高雄：敦理出版社，1978.03）。

———，《心標》（高雄：敦理出版社，1987.01）。

———，《同根生》（高雄：敦理出版社，1978.06）。

———，《連雲夢》（高雄：敦理出版社，1987.01）。

———，《工廠人》（台北：文皇出版社，1975.04）。

廖正宏、黃俊傑、蕭新煌，《光復後台灣農業政策的演變：歷史與社會的分析》（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6.08）。

趙 剛，《求索：陳映真的文學之路》（台北：聯經出版社／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2011.09）。

——，《告別妒恨：民主危機與出路的探索》（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1998）。

謝國雄，《純勞動：台灣勞動體制諸論》（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1997.09）。

龐建國，《國家發展理論：兼論台灣發展經驗》（台北：巨流圖書公司，2005.07）。

Burawoy, Michael (邁可·布若威) 著，林宗弘等譯，《製造甘願：壟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歷史變遷》（台北：群學出版公司，2005.04）。

二、論文

（一）期刊論文

王振寰，〈國家角色，依賴發展與階級關係——從四個有關台灣發展的研究談起〉，《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卷1期（1988春季號），頁117-143。

李淑君，〈資本主義及現代性下的女工——論楊青矗小說中的女工主體與處境〉，《臺灣文學評論》6卷4期（2006.10），頁71-93。

侯如綺，〈楊青矗小說《工廠女兒圈》中的女性關懷〉，《臺灣文藝》182期（2002.06），頁31-47。

范文馨，〈A Biographical and Critical Study on Yang Ch'ing-Ch'u: The Writer of New Journalism in Taiwan〉，《空大人文學報》9期（2000.10），頁55-90。

陳光興，〈陳映真的第三世界：狂人／瘋子／精神病篇〉，《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8期（2010.06），頁215-268。

賴佳欣，〈女兒國度的美麗與哀愁——論楊青矗《工廠女兒圈》的女工群像〉，《歷史教育》12期（2008.06），頁131-186。

Bowles, Samuel and Gintis, Herbert. *Democracy and Capitalism: Property, Community,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Modern Social Though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Drucker, Peter. *Men, Ideas, and Politics*.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10)

Du Gay, Paul ed. *Production of Culture/Cultures of Production* (London: Sage, 1997)

Eisenstein, Zillah ed.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 Fineman, Stephen ed. *Emotion in Organization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3)
- Foucault, Michel. *Power: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 Edited by James D. Faubion. Translated by Robert Hurley and other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4)
- Gallop, Jane. *Reading Laca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 Gane, Mike and Terry Johnson. *Foucault's New Domains* (London: Routledge, 1993)
- Hall, Stuart ed.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7)
- Hall, Stuart and Paul du Gay ed.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London:Sage Publications, 1996)
- Kung, Lydia. *Factory Women in Taiwan* (Ann Arbor, Mich.: UMI Research Press, 1983)
- Marshall, Barbara. *Engendering Modernity: Feminism,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Change*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4)
- McKinlay, Alan and Ken Starkey ed. *Foucault,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Theory: From Panopticon to Technologies of Self*(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8)
- Mitter, Swasti. *Common Fate, Common Bond: Women in the Global Economy* (London: Pluto, 1986)
- Morley, David and Kuan-Hsing Chen ed.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1996)
- Nash, June and Maria Patricia Fernandez-Kelly ed. *Women, Men,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3)
- Sargent, Lydia ed. *Women and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1)

(二) 學位論文

- 陳曉娟，〈楊青矗小說中的抗爭主題研究〉（台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0）。